

SHIGE
MANLUN

詩歌漫論

李元洛

7.2

诗 歌 漫 论

李元洛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125印张 124,000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统一书号：10107·165 定价：0.37元

目 录

金鼓·枪刺·繁花

——试论诗歌怎样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1)

试论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特色 (10)

读鲁迅诗论札记 (19)

万紫千红总是春

——诗歌多样化片谈 (27)

诗与政治 (33)

大笔浓墨 警策动人

——谈政治抒情诗的创作 (40)

利如锋刃 妙趣横生

——谈政治讽刺诗的创作 (45)

“犹矿出金 如铅出银”

——谈诗与生活 (50)

诗的意境 (56)

诗贵创新 (61)

巧思和创新 (66)

“诗中有画”

——读古典诗歌札记 (71)

诗的警句·····	(78)
诗的博喻	
——读诗札记·····	(83)
略谈我国古典诗歌音乐美的传统·····	(89)
谈诗歌的韵律·····	(95)
叙事诗的剪裁·····	(101)
叙事诗中的自然景物描写	
——读诗札记·····	(106)
洞庭诗话	
诗与春天·····	(113)
“高歌唱出花千树”·····	(114)
诗的创新·····	(116)
丰美的想象·····	(118)
学习民歌的思想感情·····	(120)
民歌与革命浪漫主义·····	(121)
新民歌中的爱情描写·····	(123)
“余情不尽”·····	(124)
“考据家不可与言诗”·····	(126)
“一诗千改始心安”·····	(128)
谈《将军三部曲》的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	(130)
新时代的边塞诗	
——读郭小川的《边塞新歌》·····	(140)
雪压霜欺花更艳	
——读郭小川同志遗作·····	(148)

高吟肺腑走风雷

——读贺敬之新篇兼谈政治抒情诗的创作 (158)

炼字 炼句 炼意

——读李瑛的诗集《北疆红似火》 (166)

读未央的《葵扇》 (173)

公社大地战旗红

——读管用和同志的诗 (176)

车间的战鼓

——读张觉的诗 (185)

后 记 (189)

3
4
3
4
3
4
3
4
3
4
3
4
3
4
3
4

金鼓·枪刺·繁花

——试论诗歌怎样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一九七九年，早春的蓓蕾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一起，迎来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新春。在奔向四个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的起点站上，祖国的列车鸣响了气壮山河的汽笛，启动了雷霆万钧的车轮，并将冲破一切阻力，风驰电掣地奔向万里征程。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最伟大、最光荣的政治任务，时代和人民向诗作者提出了一个庄严的课题：诗歌怎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放声歌唱？

诗歌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放声歌唱，对于我们这一代诗作者而言，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反映时代精神，使诗歌成为鼓点和投枪；要做到题材、体裁、风格、流派、手法的多样化，使诗苑百花盛开；要努力提高诗艺，使诗作为真正的艺术品。

中外古今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总是以其丰富多彩的生活图画，反映了时代的某些本质和规律，表达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愿望与理想。以抒情见长的诗歌，则更是如此。别林斯基曾经指出：“在构成真正的诗人的许多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诗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是

自己时代的产儿。”马雅可夫斯基也曾经歌吟：“再过几百年，如果在纸堆中挑出一行诗，就可以使这个时代重视。”我国唐代诗国的两颗巨星李白与杜甫的作品，之所以被誉为“盛唐之音”和“诗中之史”，就是因为他们分别以不同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他们的时代。当代无产阶级优秀诗人郭小川，对于时代总是怀着一种庄严而热烈的情感，以反映时代作为自己的诗作的崇高使命。他说：“我时常想，我怎样才能把这种时代精神和时代感情表现出来。”（《投入火热的斗争·后记》），“仿佛是滚滚的沉雷从万丈以上的云端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国土上卷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仿佛是豪迈的昆仑山拍着硬朗的胸脯向我们担保：中国人前所未有的黄金的日子真是来到了！”诗人早在作于五十年代初期的《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就情溢乎辞地讴歌了新时代的到来，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概括了时代的精神与人民的愿望。这，也正是它至今仍然使读者心潮激荡的根本原因。

“时代精神”这一命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最早见于《第一七九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提出了“为本身开辟道路的时代精神”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四十九页）我以为，一定时代的时代精神，是由决定着时代的主要生活内容和时代发展的方向的人民群众所决定的。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时代精神的主要内容就是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就是广大人民推动历史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革命精神，就是人民迫切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情绪、愿望和意志。

今天，诗歌要真实而强烈地反映时代精神，就必须解放思

想，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是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可是，这一原本属于常识范围以内的问题，过去也被“四人帮”以批判“暴露文学”为借口而搞得混乱不堪。我们的社会生活本来是矛盾对立的统一，有光明也有黑暗，有革命也有反动，有英雄也有丑类，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因此，做为反映与推动生活前进的诗歌，当然也应该有歌颂也有暴露。诗歌史上堪称“爱的大纛”与“憎的丰碑”的天安门诗歌，不就是以长江大河般的激情，歌颂了周总理与民主自由的精神，以狂飙烈火般的愤怒，暴露批判了万恶的“四人帮”吗？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正义受难，真理蒙尘，人民心中愤怒的火山一触即发，可是，那种浮泛的廉价的颂歌却充斥诗坛，假话、空话、大话、废话比比皆是，帮助宣扬愚民政策的“神曲”屡见不鲜，唱班诗、应制诗、样板诗、批判诗俨然成了诗坛的盟主。“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象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那种表现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的有胆有识的诗章，真是凤毛麟角。今天，我们的诗歌当然要以真实而不是虚假的感情，歌颂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刘真的《哭你，彭德怀司令员》、白桦的《回来吧，贺老总》、徐刚的《致冶金工业部长》，以及孙静轩的《在陈毅同志故居》、欣秋的《接龙桥》，礼赞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工农兵群众，如曲有源的《四个现代化之歌》、李瑛的《钻塔、钻头及其它》、饶阶巴桑的《向一秒钟要钢》，以及刘不朽的《三峡诗情》、王宗仁的《昆仑短笛》，讴歌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新的英雄人物，如艾青的《在浪尖上》、张志民的《按

照人民的命令》、邵燕祥的《致窦守芳同志》、叶文福《雷雨中的海燕》等等，就都是当前诗坛上一些有力的作品。如果说，诗歌在五十年代曾产生过豪唱入云的《致青年公民》《放声歌唱》，在六十年代初期曾出现过风传一时的《厦门风姿》《雷锋之歌》，难道今天的诗歌不应该后来居上，写出更多更好的金鸣玉振的颂歌吗？是的，我们要以歌颂光明为主，在今天这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美好时代，我们要谱写更多的真而且美的光明颂。但是，无可怀疑的是，我们现在也十分需要揭露矛盾、批判黑暗、鞭挞一切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事物的诗的投枪！因为从这一侧面同样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时代精神。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空前广泛而又深入的革命，在现实生活中，还潜伏着阻挠社会变革、破坏四个现代化的阶级敌人，还游荡着远未肃清的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存在着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蒙昧主义、奴隶主义、本本主义等等反科学反民主的旧事物与旧思想，我们的诗作者怎能视而不见，不予以揭露而大张挞伐呢？古代的优秀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并没有想到去动摇封建制度，但他们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意愿的诗章，今天仍然光芒万丈，我们今天的诗作者为什么不可以在维护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之下，去揭露、抨击落后的反动的事物，以推动时代车轮的前进呢？所贵者胆，所要者魂！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批判了“四人帮”，宣告“真理是人民共同的财富，就象太阳，谁也不能垄断”，以其争取与保卫人民民主的严峻主题，发人警醒；青年作者李发模的《呼声》，第一次在诗歌中（也是在文艺作品中），尖锐地诛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变种——反动的

“血统论”，呼唤“闪电呵，你在何处？你在何处？快快斩下吧，斩断这伙祸根！”声情激越，促人深思；还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作者郭小林的《戒烟》，思想敏锐，提出了一些为人民所关心的尖锐问题，表达了人民共有的爱憎：“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但我不能也爱他衣服上的污垢；我爱我的祖国，是的！但我不忍看他为愚昧和落后所囚；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但我绝不能爱那些寄生吸血的群丑；我爱我的祖国，是的！但我绝不能爱那些戴冠佩剑的沐猴！”这些，可以说是近来诗坛上有棱有角的作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品也要从人民群众生活中来，又回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接受检验。事实证明，只有反映了时代精神，提出人民最关心而还没有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真正表达了人民心声的作品，才是具有真正的生命力的。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诗作者要站在时代的前列，继承和发扬“五四”与“四五”的革命精神，既要当鼓手，又要做清道夫，既要唱风起云飞的进行曲，又要唱披荆斩棘的大路歌！

现实斗争生活无比丰富多彩，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也多种多样，诗歌要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诗作者必须以党的双百方针为指针，彻底砸烂林彪、“四人帮”设置的一切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发扬艺术上最可贵的创新精神，以现代革命题材为主，努力促进题材、体裁、风格、流派、手法的多样化，彻底改变题材单调、千人一面、手法雷同的现象，真正做到诗歌园地的万紫千红。

打倒“四人帮”以来，有的文章认为“诗歌园地百花齐放的春天已经到来”，这种说法我是不敢同意的。十载风霜刚刚

过去，早春二月刚刚来临，双百方针刚刚开始真正贯彻，诗歌园林刚刚复苏，过于乐观的不切实际的估计，对诗歌的发展和繁荣并没有益处。艺术民主是为政治民主所决定的，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和政治上的充分民主紧相联系。林彪、“四人帮”对文艺所实行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审判自不待言，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如同整个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极不充分一样，由于来自右的和“左”的、特别是“左”的干扰破坏，双百方针未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诗歌也远远没有做到政治方向一致下的百花齐放，郭小川政治上正确、艺术上独创一格的优秀之作《望星空》，不就受到关锋之流的“批判”和来自同志的粗暴批评吗？我以为，双百方针的实质就是它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就允许艺术上各种题材、各种形式、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自由竞赛，就提倡发扬艺术家的个性与艺术创作上的独创性，就必然带来诗歌的多样化。从诗歌史来看，题材、体裁、形式、风格、流派、手法的多样化，从来就是诗歌繁荣昌盛的必具标志，而单调与贫乏，则一定是单调或者衰落的表征。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的唐诗，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倒是可以说百花竞放，万紫千红的。论题材，世上疮痍、民间疾苦、民族矛盾、时代风情、乃至边塞、征戍、迁谪、宫怨、闺情、思乡、怀友、览古、登临、题咏、赠别等等，堪称大千世界，尽收笔底；言体裁与形式，唐诗继往开来，集古典诗歌体式之大成，以后一千多年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词另当别论）；谈风格，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独出机杼、个性鲜明的诗人如群星灿烂，各放异彩；说手法，唐诗斗巧逞奇，

是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现在人们远未得其全部珠玉的宝库。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早就发出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赞叹，而我们也常常追怀我们这个诗的国度昔日的光荣。

在我们这个历史的伟大转变的时期，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基础上来一个新的“文艺复兴”，难道不应该产生更多更好的诗才横溢的诗人，难道不能造成超越唐诗的繁荣局面吗？现在，政治民主与艺术民主的提倡发扬，为诗歌的百花盛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四个现代化的崭新事业与壮丽斗争，为诗人开拓了具有空前广度与深度的用武之地。在这里，题材的多样化与诗人独创性的发扬，就成了诗歌多样化的关键。我们的诗作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放思想，投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火热斗争，独立思考，大胆破格创新，扩大题材领域，探索各种体裁形式，创造独树一帜的风格，开创多种多样的流派，使诗歌做到多样而统一。从《长江文艺》一九七八年的诗专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们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如《工地·炉前·车间》与《公社新歌》这两组诗，王家新、董宏量、李圣强、彭泉瀚、黄耀晖的一些作品就各有特色。是的，自然界橙黄桔绿的秋光和嫩蕊繁花的春色是各有胜长、互不相掩的，那么，在诗歌的百花园中，就让富丽的牡丹、芬芳的丹桂、馥郁的丁香、映日的芙蓉、出墙的红杏并季而开，就让春兰秋菊冬梅夏荷同时怒放吧！

诗歌要有力地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还必须把诗当成一门并非可以轻易登堂入室的艺术，努力提高诗艺水平。

形象性，是文学艺术的根本特征。文艺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发挥其为政治服务的作用的，做为最集中、最精炼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诗歌，也必须充分发挥诗歌所以成为诗歌的特殊手段与性能，才能真正达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恩格斯称赞维尔特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同时也极赞他的诗作的“火一样的热情”与“独创性”。郭小川热切地向往“斗争的文学”，但是，他也很强调“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他说他“越来越有一个顽固的观念：一个诗作者，一定要有独特的风格”。可以说，“斗争的文学”与“独特的艺术文学”，是郭小川全部诗歌美学思想的核心。因此，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必须讲究诗之所以为诗的独特艺术。诗歌，是以强烈的抒情、巧妙的构思和美好的意境取胜的，只有将深沉浓烈的真情与对生活的真知灼见，交融在鲜明的独具个性的创造性的形象之中，诗歌才能真正具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力量，这，不是为古今优秀诗作所反复证明，也为“四人帮”肆虐时违背诗歌创作艺术规律的作品所证明了吗？

“四人帮”炮制“阴谋文艺”，实际上它们没有文艺而只有阴谋，其作品都是赤裸裸地宣扬其反革命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内容上说假话，表现上概念化、公式化，成了诗歌创作严重的“内伤”。“四人帮”在诗歌领域散布的瘟疫，至今还远远没有扫荡以尽：诗贵意境，但很多诗作忽视美好意境的创造，脱离生活，图解政治概念，罗列标语口号；诗讲究构思，但很多诗作忽视巧妙构思的追求，平铺直叙，一览无余，缺乏情致，没有韵味；诗需要独创，但不少诗作没有自己

的思想与艺术的探索，千部一腔，千唱一喙，满足于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诗必须精炼，但不少诗作却担负起了散文的任务，洋洋洒洒，而不是力求以少胜多，以一语胜人千百。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违反了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诗歌创作何尝不是如此？当前，诗歌的数量并不少，但打油诗确实太多了，这也是现在的诗歌在群众中声誉不高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十分讲究诗的艺术，把诗歌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共性，寓于鲜明独特的美好形象和意境之中，既有真情实感和思想锋芒，又有艺术独创，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诗歌的战斗作用。

诗人们，让我们擂响震天的金鼓，挥动犀利的枪刺，弹动优美的琴弦，捧献多彩的花束，为四个现代化放声歌唱！

试论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特色

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共同艺术规律，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都是形象思维所开放的花朵。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不仅要认识事物的共同点，即矛盾的普遍性，还要认识事物各自的特点，即矛盾的特殊性。那么，形象思维在诗歌创作中，较之在其它文学样式的创作中有什么特殊性呢？我想从意境、抒情、想象三个方面，将唐宋诗予以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作一些粗略的探讨。

形象性，是文艺区别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的特征，艺术形象，是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诗歌，与其它文学样式一样，都要运用形象思维来进行构思，都要塑造艺术形象。但是，由于诗歌以最集中最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见长，以直接而强烈的抒情取胜，所以诗歌形象就绝不是生活形象的模拟和复制，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具体生动的形象。一般说来，小说、戏剧的形象中心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散文因为内容和写法相当自由，它的形象可以是作者塑造的典型人物，也可以是一幅形散神不散的生活图画，而诗歌形象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既是非常鲜明突出、十分凝炼深厚的，又是具有高度创造性和美学意义的。诗歌艺术形

象创造的这一特色，可以用“意境”一词表述。也就是说，诗歌要以极度精炼传神的笔墨，创造出鲜明独特内涵深远的意境。我以为，这正是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表现在诗歌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关于诗歌形象思维的这一特点，我国古典诗论曾经作过一些有益的阐述。唐代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之“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宋代梅圣俞之“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王国维《人间词话》之“诗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王国维托名樊志厚作的《人间词乙稿序》之“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等等，都是强调诗的形象必须鲜明凝炼、包孕深厚，构成内情与外景水乳交融、情理形神辩证统一的富于感染力和启示力的意境。唐代优秀诗人谈诗歌创作，李白有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则说：“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刘禹锡作了形象的描绘：“横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宋代陆游作了动人的歌吟：“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他们实际上都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形象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也说明了诗歌应该创造出鲜明独特寄慨遥深的意境。的确，没有意境就没有诗歌，没有创造性的内涵深远的意境，就没有真正动人的诗歌。古往今来的优秀诗作，之所以具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魅力，就是因为诗人把饱满强烈的感情与对生活的深刻发现与认识，和谐地交融在鲜明独创的堪称“是一个‘这个’”的形象之中。相反，那些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作品，正是违背了形象思维规律与无视诗歌形象特殊要求的结果。

唐朝，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诗人们运用形象思维规律创作的灿若群星的作品，其可贵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多彩多姿美不胜收的意境。李白的“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情景交融、落想不凡，言尽意不绝地表现了诗人的胜慨豪情；杜甫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抚今追昔，沉郁顿挫，发人深思地抒写了家国盛衰的深沉感喟；岑参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奇丽雄豪的笔墨勾画了边塞风光，是盛唐边塞诗中的力作；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独出机杼的比喻抒发了忠贞不二的爱情，千百年来动人心弦。总之，“唐人以诗为诗”（吴乔：《围炉诗话》），尊重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重视意境的创造，把诗歌艺术推向了古典诗歌史上的最高峰，如同鲁迅所说的“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相反，在当时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在“资书以为诗”、“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等错误创作思想的引导下，多数“宋人以文为诗”（《吴乔：围炉诗话》），一反唐人规律。宋代诗坛四百年，尽管作者和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唐代，其中也不乏好诗，但由于以说理代替抒情，以剿袭代替创造，以獭祭古典代替对生活的反映，所以很多作品形象干瘪，更谈不上意境。例如宋初以杨亿、钱惟演、刘筠为主的“西昆体”，标榜以晚唐李商隐为宗，实际上只是全盘接受与恶性发展了李诗部分作品雕琢粉饰的弊病，却全然抛弃了李诗韵远情深、意境含蓄的长处。他们三人都曾以“泪”为题赋诗，无一不是